

浙江仙居下汤遗址考古的感想

仲召兵

4月24日上午,“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结果在北京揭晓。作为下汤遗址的领队,参与和负责下汤遗址的发掘项目前后整整十年,获悉下汤入选时,心情其实是复杂的,感触很深,这要从下汤遗址的发现和考古工作谈起。

破土而出

仙居,这座由宋真宗赐名的县城,位于浙江东南的丘陵盆地之间,地处浙江第三大河灵江的上游。这里山多田少,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为了大力发展农业经济,当地兴起了取土造田运动。横溪镇下汤村东北俗名“汤墩”的高地自然首当其冲,甚至村里早年建造土坯房的泥土也是取自汤墩上。在取土的过程中,陆陆续续有一些陶片,甚至完整的陶器及石器出土,但由于不知为文物,大多被村民丢弃。直到1984年,才由村民张金苗将出土的这些文物送到仙居县文物管理部门。

此时,正值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省、市的文物工作者一致认定这是一处重要的新石器时代遗址。1986年、1989年,下汤先后被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在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上,将遗址的年代推定为距今4000~7000年,这样的遗址在钱塘江以南地区凤毛麟角,也代表了当时浙江乃至我国东南地区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

现在我们知道,当时关于年代的认识是有局限性的,这是时代使然,客观条件使然。下汤就这样被无意地打开,却又依然盖着神秘的面纱。它像是一块很有价值的石头,被扔进了“河姆渡”这条大河里,没有激起一朵浪花,等待有一天考古人的发掘,来揭开其真正的身世。下汤因此错过了命名为一个新的考古学文化的机会。

首次试掘

时间来到了2001年,因为下汤遗址所在的横溪镇重新编制村镇发展规划,应仙居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和横溪镇人民政府邀请,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排王海明、孙国平于同年3月15日至18日对下汤遗址进行了调查试掘。试掘结束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立立即向浙江省文物局呈交了“关于仙居县下汤遗址调查情况及建议扩大遗址保护范围的请示”报告,其中写道“该遗址保存完好,文化层堆积厚,遗址中心文化层厚达2.5米以上,内涵丰富,陶器以泥质红衣陶居多,泥质红衣陶平底罐最具特征,主要器物有罐、釜(鼎)、盆、豆、杯等,文化面貌与河姆渡文化区别明显,年代距今约5500年”。

据当年负责试掘的王海明及参与发掘的民工杨明启回忆,在遗址东面土筑围墙的东、西两侧均有发掘,不止两个探坑,探坑规格大概2米宽,3米长。非常巧合的是,其中一个探坑就位于我们去年的发掘探方内,被我们重新清理了出来。当年可能是发掘位置不理想的原因,没有发现遗迹现象,只是出土了较多的陶片及石制品,下汤遗址真正的身世依然没有解开。

与此大体同时,2000年11月,蒋乐平在浦阳江流域的专题调查中发现了浦江上山遗址,并于当年进行了小规模发掘,对发掘出土的夹炭陶片进行了年代测定,距今超过10000年,这为之后“上山文化”的命名提供了条件和支撑。

初露真容

2014年12月至2015年1月,因位于横溪的仙居工业园区规划建设,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遗址



出土上山文化典型器物



考古队员合影



下汤遗址近景(由西向东)

进行全面的考古勘探,本次勘探由同事时箫负责。经过一个多月的勘探,确定“汤墩”为遗址的分布范围,面积近3万平方米,也了解了文化层堆积的大体情况。2015年3月,在勘探的基础上,时箫选择在遗址中心部位进行了试掘。4月中旬,时箫因另有工作安排,时箫领导安排我接替下汤的考古工作,就这样,偶然的机会,我与下汤结下了难解之缘。目前,我在下汤的工作,断断续续,已达十年,可以预见,这将是我职业生命中工作年限最长、感情最深的遗址。

言归正传,2015年试掘的最大收获是,通过对地层出土陶片的整理,结合一系列碳十四测年数据,了解到遗址历经上山文化、跨湖桥文化、河姆渡文化、好川文化四个时期,纵贯新石器时代始终,绝对年代距今9300~4000年,年代跨度这么长,文化序列这么全的遗址在浙江绝无仅有,在全国也是罕见的。而且在最底部的生土面上,还发现了丰富的遗迹现象。当刮去尘封万年的泥土,大大小小的灰坑、基槽、沟渠、石磨盘呈现在眼前的时候,我仿佛看见9000多年前,先民在此生活、劳作的场景。试掘的探方,犹如一扇窗口,终于让我们窥见下汤在历史的长河中准确的年代坐标,窥见远古村落的冰山一角。

迎来良机

2018年,下汤遗址被纳入浙江省第二批省级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名单。为配合遗址公园建设,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遗址进行了正式发掘,发掘面积1000平方米。本次发掘,除了进一步确认了遗址的年代,还发现了“红烧土广场”、食物加工场、器物坑、环壕等重要遗迹现象,但因为当时野外没有保护棚,我们决定暂停发掘,覆膜保护。

2019年,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成功。2022年,浙江省委、省政府将上山文化遗址群作为浙江省下一个申遗目标,下汤便是其中遗址之一。2022年,在国家文物局支持下,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共同申报了“考古中国——长江中下游早期稻作农业社会的形成研究”重大课题并获立项。与之前不同的是,本次发掘是课题主导下的主动性发掘,发掘目标也更为明确,即通过下汤遗址“解剖麻雀”,了解早期稻作农业社会的聚落形态和社会结构,复原和重建古代社会。

万年图景

下汤遗址的发掘从2018年第一次发掘就有了聚落考古的理念。除了遗址中心土墩的发掘,在遗址的边缘也布设了长探沟,了解到环壕的存在。纳入“考古中国”课题后,聚落考古的理念得到了进一步深化和落实。我们从聚落结构着眼,2022年至2023年,通过长探沟发现遗址北部分布有数个上山文化时期人工土台。2024年,发掘了遗址东部,结果发现了排列更为规整的人工土台5座,这些人工土台呈环绕状分布在2018年发掘的中心土墩的北部和东部,至此,上山文化时期中心台地—外圈人工土台—环壕的三重聚落结构豁然开朗,感觉下汤这个万年古村落被解锁了。

通过2018年、2022年至2024年四个年度的发掘,我们发现了非常丰富的遗迹现象,包括土台、房址、灰坑、窖穴、器物坑、高等级墓葬、食物加工场、红烧土广场、沟渠、基槽等,可调全景式揭露了下汤早期村落的样态。

古今共情

下汤遗址从万年走来,历经整个新石器时代烟火不断,之所以能够如此,与它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是分不开的。遗址位于灵江上游一处盆地中央的自然台地上,现高出周边农田1~2米。四面环山,东西邻水,南面距永安溪约2千米,地理环境非常优越,如同世外桃源般的存在。下汤的绵延万年,是人类尊重自然、利用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样本和范例。在这样的遗址考古,我时常思绪被拉回到那个时代,仿佛徜徉在万年的村落,流连忘返,想象着先民们田园生活的各种场景,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与自然和时光相守,颐养天年,怡然自得。这或许就是我们现代人向往田园生活的心愿,也为我们平衡现代工作和生活的压力提供了启迪。

(作者单位: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十大考古领队说

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结果已于今年4月揭晓。从旧石器的“百科全书”到新石器的“人间烟火”,从中原与边疆到“三重城”“一号墓”、从“城市之根”到“城市之源”……“十大考古”揭开了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密码,也为中华文明图谱勾勒精彩一笔,让我们更懂“何以中国”。这是一次年度成果的汇报、一段考古故事的讲述,也是一场考古人的聚会,帷幕落下后,考古人又将坐上开往工地的列车、奔赴田野,投入到寻找过去未知真相的工作中。

为进一步阐释“十大考古”的多重价值、把宣传传播做得更加到位,《中国文物报·考古专刊》今起推出“十大考古·领队说”专栏,以遗址发现始末、发掘精彩瞬间、研究最新进展为依托,为读者呈现考古背后的故事,带领读者置身历史现场,身临其境地感受绚丽厚重的文明。通过项目负责人、一线考古人的讲述,用大众语言,讲出遗址的好故事。持续推进考古发掘、研究阐释与活化利用,将深埋地下的历史遗存转化为可感可知的时代画卷,增强文化自信、赓续文明薪火。

2020年初春,武王墩考古项目正式启动,到2024年12月完成一号墓发掘工作,取得重要的阶段性成果。通过专题调查,摸清了周边近200平方千米范围内战国晚期楚文化遗存状况;通过勘探明确了陵园范围及布局;一号墓发掘出土文物1万多件,揭示了规模巨大、结构最复杂的大型楚国最高等级墓葬,也是迄今为止经过科学发掘的唯一一座楚国王陵墓。武王墩一号墓也先后入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2024年中国考古新发现”和“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历时5年、数度寒暑,在全体考古队员的共同努力下,顺利完成一号墓发掘工作。因本项目的重要性,国家文物局和安徽省政府及主管部门高度重视,提出了高标准的要求,所以我们一开始就确定了发掘质量第一的思想并贯穿于考古工作全过程。

充分细致的前期准备工作

公元前241年,楚国迁都寿春,在这里延续了考烈王(熊元)、幽王(熊悍)、哀王(熊犹)、负刍四王。公元前223年,秦军占领寿春,俘楚王负刍,至此,雄踞于南方的强大楚国走到了终点。都城寿春城遗址位于安徽省寿县寿春镇,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自寿春城向东十余千米的舜耕山南麓,便是武王墩,此地今属淮南市田家庵区三和镇徐洼村。

早在20世纪初,寿县一带就出土大量楚国文物,包括30年代被盗掘的李三孤堆青铜器群。后来寿春城遗址的考古工作也不断有新发现,其中有“鄂君启金节”“大府铜牛”等非常珍贵的器物。根据考古发现和研究结果,寿春城遗址及其周边地区分布着丰富的楚国遗存,都城以东是楚国大中型墓葬的分布区域,武王墩就在这个墓区的北端。可以看出这片区域对于楚国历史、楚文化研究的重要意义,武王墩考古项目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发掘武王墩的决定是综合分析了紧急程度、现实条件、科技水平等多方面因素后做出的。大型墓葬发掘是一项系统工程,发掘难度大,影响发掘质量的因素很多,武王墩考古发掘工作不容有失,所以在工作开始之前,需要做好万全的准备。

考虑可能影响考古发掘的诸多因素,遵循科学化、规范化、精细化的指导思想,考古发掘与文物保护工作同步推进的原则,考古队制定了详细的工作方案和工作流程、应急预案。封土、填土、墓室的发掘均分别采用不同的发掘方法,包括椁室木材的拆解转运都有具体的方案。

同时,要具备必要的工作设施和技术条件,包括考古勘探、考古用地、现场的设备设施、安保、技术、队伍组建等,还包括对相关文献和考古资料的收集分析。前期准备过程用了约半年左右。

方案和应急预案在经过多次论证获批后,武王墩一号墓的发掘工作从2020年9月开始。在当地政府支持下,一号墓现场建造了保护大棚,文物库房、文物保护实验室、安保警务室、宿舍等也相继落成,总建筑面积1万多平方米。相对完善的工作和生活设施,对发掘工作顺利推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新技术广泛应用于发掘过程中

新技术应用已是当今考古发掘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提供的新手段、新工具,可以获取更多的信息,使我们发现和分析的能力不断增强,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水平不断提高,这也是考古工作高质量的保障。为此我们建立了多学科、多平台、多领域的专家和团队协作的工作机制,先后参加武王墩发掘、保护、研究工作的大学和科研机构有30多家,取得非常好的效果。

首先建设了武王墩墓考古发掘项目综合业务管理平台,所有记录资料实时存入,做到考古发掘数据资料高效科学采集、记录与管理,并提供了对出土文物的全流程跟踪与管理等应用支撑。在现场信息采集方面,我们既有传统的采集记录方式,又有多种新技术手段进行数据精确采集。基于GIS技术,融合高精度分层正射影像数据,实现利用考古记录移动终端系统对考古现场探方、遗迹以及出土文物等考古对象的地理空间数据的采集,精确定位和记录考古发掘单元每层出土文物的空间位置坐标,快速生成所需层位正射影像,用于出土文物分布位置标记和记录。此外,考古队还聘请专业团队对发掘全过程进行摄像记录,留下海量的第一手资料。这些都为后续武王墩考古资料的研究与利用奠定了良好的数据基础。

在考古发掘的具体过程中,墓葬本身所处的环境并不稳定,文物保护难度高,发掘清理的时间窗口有限,不能忙中出错、忙中出乱,要保证文物被完好提取出来,放到安全的环境里,这是最重要、最紧急的任务。根据预先研判墓中可能保存的各类文物,对于不同材质、状态的文物,采取不同的发掘、保护和研究方法,“对症下药”,各有侧重,有针对性地进行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工作。

椁室是发掘中最关键的环节。为了早做准备,需要利用新的手段提前了解,其中高密度电阻率法探测取得了较好效果。这是一种阵列勘探方法,岩石、土层的导电性存在差异,人工施加稳定电流场时,电流的传导、分布规律也有区别,设置高密度观测点,对获取的参数进行处理和成像。经过多次探测,我们不仅提前了解到椁室的大致结构,更重要的是预知墓室中有大量积水。这使得我们可以有针对性地做好准备工作,更科学地调整发掘方案。



考古队员合影



镂空玉璧

盖板揭开后,现场环境控制是非常重要的。为防止椁木和漆木器、纺织品、植物类遗存等脆弱质文物和复杂遗迹快速失水而发生干缩、开裂、变形、劣化,需进行保湿处理。我们在发掘现场设计安装了自动雾化喷淋系统,定时进行喷淋保湿,同时尽量控制温度,并覆盖塑料薄膜防止水分流失过快,保障发掘过程中文物和椁室安全。考虑到打开后可能出现的各种紧急情况,要求必须尽可能保留最多的文物信息,同时尽快提取文物并送到实验室,力求最大限度保障文物安全。在提取文物之前,先对它的位置和状态进行扫描、测绘、记录,在现场初步判断每一件文物保存状态,决定提取的顺序。我们把文物保护技术人员编组到各发掘组中共同工作,发掘过程中遇到的脆弱质文物和复杂堆积遗迹,先采集痕迹信息,在现场第一时间就进行应急保护,采取薄荷醇、石膏绷带、高分子绷带、液氮冷冻、插板等材料与方法进行提取,转移到实验室内再开展室内精细化清理和稳定性保护。

考古和文物保护实验室就设置在发掘现场200多米处,包括低氧灭菌室、分析检测室、纺织品文物保护室、无机质文物保护室等等,各个实验室分工不同,分别负责处理不同材质的文物,针对性解决精细化的问题。许多有机质文物容易腐烂、变质,低氧灭菌舱可以实现温度、湿度和氧气的控制,将含氧量限制在0.5%左右,湿度控制为99%,能够有效减缓文物的劣化速度,实现文物杀菌和稳定性保存的目标。墓室内提取出来的有机质文物都会先存放在这里,等待后续的进一步处理。分析检测室进行的相关工作主要是文物材质、成分、图案等的检测研究,对不同质地的文物进行细致观察和分析之后,确定它们的成分和状态,从而进一步制定保护修复和研究方案。除了三维视频显微镜、红外光谱、扫描电子显微镜观察等常规手段外,我们还使用了一些新技术。比如采用X射线探伤技术,对出土青铜器的制作工艺和病害进行研究;有些漆器上的图案颜色暗淡,用曲面微区X射线荧光光谱仪,提取纹饰和图案信息,并绘制出元素分布图,初步判断各种材料的可能产地,这些信息都为后续修复提供了科学依据。这种新型的光谱仪还是首次应用于文物保护和研究中。

保持发掘队伍的相对稳定

以往安徽地区大型墓葬的发掘较少,较重要的有汉代六安王墓和蚌埠周代钟离国君墓,但其规模和发掘周期远不能与武王墩相比,缺乏经验可循。对于作为项目领队的我来说,同样没有此类经历。武王墩考古项目自启动伊始,便吸引了学界的目光。接受任务后,深感责任之重,我既感受到压力,也面临巨大的挑战,敬畏与期待之心交织,从最初的准备、布方,到后续发掘保护,每个环节都如履薄冰,丝毫不敢懈怠。好在国家文物局派出了张仲立、徐良高、刘建国组成的专家组全程指导,让我心中踏实了很多。

要保证高质量完成武王墩发掘任务,必须要组建一支能战斗的队伍。立项之时,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全部考古业务人员只有20人,显然不能满足武王墩工作的需求。为此,根据发掘工作总体的需要,除了本所和淮南市博物馆以外,在国家文物局支持下,我们邀请了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山东大学考古学院,作为合作队伍共同组建了武王墩考古队。

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张治国研究员的团队主要承担了出土文物的现场保护工作,厦门大学张闻捷教授和山东大学路国权教授的团队主要承担田野发掘和资料整理工作,他们的加入弥补了安徽考古队伍的短板,对本项目高质量完成作出了重要贡献。

进入墓坑填土和椁室发掘阶段后,考古队的常驻业务人员保持在40人以上,在提取文物的关键阶段超过50人,是安徽省单个考古项目投入人数最多的。虽然人员不断有调整,但核心的骨干队员都参与了发掘全过程,稳定的队伍也是武王墩考古工作高质量完成的保证。这支以年轻人为主的队伍来自全国各地,充满了活力,带着不同的学术背景汇聚于武王墩。他们不仅经受了武王墩高强度工作的考验,还将自己掌握的新理念、新技术,引入到武王墩考古各个环节,让考古工作更加精准、高效。通过这个项目,一批年轻的考古学者迅速成长起来,我想,从考古事业的发展来说,这也是武王墩项目的又一个贡献吧。

除了上述考古队组成单位外,先后短期参与发掘和保护研究工作的大学和科研合作单位有30多个,聚集了多院校、多学科、多领域的力量,都是对应领域里、全国范围内优秀的专家或团队。武王墩的考古工作,也让我深刻体会到团队协作的重要性。考古绝非一人之力可为,它需要各个领域的专家紧密配合、协同作战。从田野发掘的一线队员,到文物保护的专家,再到各领域的资深学者,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岗位上默默耕耘。大家为了共同的目标,齐心协力,解决了一个又一个难题,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关。考古工作不仅是对过去的追溯,更是面向未来的对话。武王墩所展现的丰富文化内涵,是鲜活的生命印记,是代代相传的文化基因。当我触摸到这些来自两千年前的文物时,历史仿佛触手可及。作为一名考古工作者,始终以敬畏之心守护文明根脉,这不仅是一份使命,更是对中华民族辉煌文化最深沉的热爱。武王墩考古,是我职业生涯中极为重要的一段经历。我们将带着这份珍贵的经历与感悟,继续做好武王墩后续研究和保护工作,尽快公布工作成果,回应学界和社会的关切。

(作者单位: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工作照